

收门票的实体书店,你还会去吗

玉渊杂谭 杨雪

惊闻某省城一家书店下月起要向所有进店读者收取20元门票,感到不可思议。书店开门做生意居然设门槛,很多网友也表示“没听说过”,不能接受。但俗话说,买的没有卖的精,市场行为不会拍脑门就做出的决定,这一纸门票背后,必然内涵丰富。

纸价、房租、人工持续上涨致使书价定高、店铺运营成本高,再加上电商、电子阅读的冲击,实体书店可谓腹背受敌。几年前进书店,遇上喜欢的书就买,大多时候不太在意网上贵个几块十几块,权当支持实体经济。但现在,把书翻过来一看价格,不得不犹豫一下,然后掏出手机上网比较。就这样,每次书店之旅基本都以带回一个文创小玩意而告终。

也许正如上述场景,很多人不知不觉也成了不太受书店欢迎的“蹭书族”——享受实体店环境、看书选书,最后一本没买,这一群体和蹲在书店里看一天书的传统“蹭书族”又不太一样。近几年,开在大商场里的各种文创综合书店门庭若市,然而,很多店营收的相当一部分,恐怕是来自

文创产品和咖啡吧。试着揣摩一下书店的“门票逻辑”:在一定程度上,现在逛书店和看展览、逛博物馆确实有点类似,比如逛一圈能获得一定的知识,累了能坐下来喝一杯,临走可能会买点纪念品。要为这些体验付费,好像也合情合理。但书店较之文博场所又有一个最大的区别:书店吸引客流之本是商品而非展品。即便是当下流行的网红书店,集购物、休闲、娱乐为一体,也不过是消费升级的一种模式。就好比,某综合商场总不能因为顾客只来吃饭看电影,不买衣服就要收门票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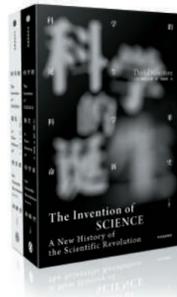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,在还没有人能回答实体书店出路何在的情况下,任何探索性的做法都值得尝试,门票制也不例外。关键是准入之后的体验,是像文艺图书馆那样能安静地坐下来阅读一天,还是像书市那样能淘到一些便宜的打折书,或是能做到举办多元化的、引领大众内容消费的活动?如果书店的供应真正能值回票价,为大众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,更有利于全民阅读,那收取门票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反正,书店收门票这事,还是市场说了算。作为一个消费者,是不用担心看不到书、买不到书的。

慧眼新境

——评伍顿《科学的诞生:科学革命新史》

字里行间 史晓雷



作者:[美]戴维·伍顿 译者:刘国伟 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:2018年4月

科学革命,是科学史领域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。美国科学史家阿诺德·萨克雷曾提到10个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,科学革命便是其一。早年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经典著作,比如有托马斯·库恩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(《哥白尼革命》,I.B.科恩的《科学中的革命》(《牛顿革命》)等。近些年国内也出现了可圈可点的理论论著,如吴以义的《科学革命的历史分析:库恩与他的理论》(从哥白尼到牛顿:日心学说的确立)。

科学革命提供了科学理论相互竞争、博弈的舞台,同时展现了诸如伽利略、牛顿这些科学巨匠的智慧风采。此外,围绕科学理论的兴衰演化,产生了旨趣迥异的科学编史观。克罗齐曾说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戴维·伍顿的《科学的诞生:科学革命新史》就是一部立足当代、回望过去,重新认识科学革命的新著。

需要指出的是,伍顿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通俗作品,也不是某种学术著作的简编本,而是厚实、严肃的学术著作。16开的中译本,仅注释和参考文献就达130多项。拙文不准备就全书做综述或点评,仅就笔者感觉颇有新意的两点做些阐发。

首先,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或者说工业革命的科学起源问题,学界争议不断。一种观点认为,科学对工业革命没什么贡献,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,科学与技术还是相互独立的。老一代的科学史(含技术史)家均持此观点。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,认为科学在工业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伍顿持后一种看法,尽管他坦承这是新近的经济史学家(工业革命史家)率先提出的——威廉·罗森的《蒸汽机、

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》极好地佐证了这一观点,但在论证上,伍顿又不同于他们。

好似手持一部单反相机,伍顿不断变换长焦和短焦镜头,远观近窥,审视历史情境、剖析事实案例。法国的帕平(通常译作巴本)和英国的纽可门是瓦特的先驱,这没什么争议。但帕平在蒸汽机方面的研究直接受益于惠更斯和波义尔,因为他曾担任他们的助手;而纽可门研制蒸汽机极可能参考了帕平的《新骨头蒸煮器续编》——这恐怕还是伍顿的新见。总之,在他看来,就科学对工业革命的影响而言,要远比历史学家愿意承认的多,结论是:科学先行,工业革命接踵而至。

其次,伍顿毫不留情地批驳了相对主义。当然,并不是说伍顿倾向于实在论,而是他对两者都打了板子,只是由于相对主义这些年误导太甚,他对此开足了火力。所谓相对主义,其实有很多版本,但总体上反对科学的普遍标准、普遍定律,否定真理与谬误的差异。库恩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大概是科学史中相对主义的始作俑者,它描述了科学理论通过科学革命不断更替的现象,却否认进程中迈向真理的指向。后来在国内颇受青睐的建构主义便是相对主义的延续或升级版,它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,夏平、谢弗的合著《利维坦与空气泵:霍布斯、波意耳与实验生活》以及谢弗的论文《玻璃制品:牛顿的棱镜和实验的运用》便是如此。

以后者为例,谢弗不断强调科学知识不是靠证据取胜,而是通过权力和说服。联想到国内相对主义的拥趸们,何尝不是如此。科学文化或科学事业,既然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,自然有社会、文化建构的成分,但科学较之于其他文化现象,最核心的法则在于科学共同体,而不是孤立的一人或几个人,通过可重复实验验证来确保证据充分的理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如果听任于建构论者,无异于伍顿所言:哲学家克里莫尼尼拒绝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进行观测,他们否认新事实,无视任何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东西,即使证据证明他们错了,他们仍可以坚持他们的信念。

此外,伍顿就一些与近代科学革命相关的词汇在词源学上做了细致分析,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深厚素养,这对读者加深理解科学革命的演化进程有所助益。

最后谈一点中译本的不足,译者不谙一些学界已达成共识的译法,有时会使得读者一头雾水。比如古希腊的四元素说,通常译作水、火、土、气,译者却把土(earth)译作“地”;爱丁堡学派的 strong program 通常译作“强纲领”,Steven Shapin 的姓氏通常译作夏平,很少译作书中的“沙宾”等。

摄手作

亭亭玉立

(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董东摄



春风化雨,字字关心

——民国学者的为师之道

桂下漫笔

胡一峰

近来媒体报道了一种现象,大多数文科类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以期未课程论文为主,而大学老师根据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评定成绩,学生看到的,往往只有分数,不知自己的论文具体“得失在何处”。实际上,在离我们不太远的过去,给作业或论文写评语是老师指导学生的基本方式,也是为人师的教学“基本功”,即便不发给学生的,也不例外。钱穆在《师友杂记》中记载了读书时的一桩往事。当时,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上学,吕思勉先生教地理课。一次考试之后,“诚之师在其室阅卷,有数同学窗外偷看,余不与之,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。适逢余一卷,诚之师阅毕,乃在卷后加批。此等考卷本不发给,只须批分数,不须加批语。乃诚之师批语,一纸加一纸,竟无休止。手握一铅笔,写久须再削。诚之师为省事,用小刀将铅笔削成两半,俾中间铅条可随时抽出,不断快写。铅条又易淡,写不出颜色来,

诚之师乃在桌上茶一杯中蘸水书之。所书纸遇湿而破,诚之师无法粘贴,乃以手拍纸,使伏贴如全纸,仍书不辍。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,亦不知其所批何语。”这段欲罢不能的评语,钱穆并未看到,吕先生也应该知道并不会反馈给钱穆,但依然写得如此激情澎湃,除了受钱穆精彩答卷之感动外,应该也和他将之视为教师本分有关吧。

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学术大师,三联版《陈寅恪集·讲义及杂稿》中收录了他给学生论文所写的数则批语,读来也给我们不少启发。1936年6月16日,他为清华大学国文系刘钟明的论文《有关云南之唐诗》写的评语是:“本论文范围甚狭,故所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,且考证亦甚审慎……所可惜者,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,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局限,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。又本论文题‘有关’二字略嫌不妥,若能改易尤佳。”同年,他给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《唐代宰相制度》写了如下评语:“大体妥当,但材料尚可补充,文字亦须修饰。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(如内藤乾吉等),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,盖

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,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。”

两则评语虽短,但传达出陈先生治学的基本取向,以及学术评价的准则。首先是材料的完备,刘同学材料搜集得充分,张同学则在材料上有欠缺。其次是选题的价值,刘同学选择云南研究唐代诗文,在陈先生看来离唐代主流文化过远,缺乏普遍意义,甚为可惜。最后,或许也是最重要的,则是学术的规范。陈先生在评语中不但提出了凡引必注的要求,而且要求说明被引之文与“本论文异同之点”。这是和陈先生自己治学讲学的“四不讲”原则一致的。所谓“四不讲”,即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也不讲;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也就是说,论文的引注并不是掉书袋炫耀自己读书多,也不是拉大旗做虎皮,搞“权威”论证,而要服务于论题所需。

与陈寅恪并称“二陈”的陈垣先生,对学生的作业、论文也是亲自批改,而且十分细致。据他的学生回忆,陈垣看到学生比较好的文章或者文章使用了新材料,就会在眉批

中写上“探幽得珠”“诸卷所无,足征独到”等加以表扬,还会在文章的最后写总评。除了写批语,他还在文章中打上各种记号,最好的在文章开头右上角画三个圈,其次是两个圈一个三角,再次是两个圈。段落中如有为他欣赏的字句,也加以圈点。对于文章中应注意的缺点、错误或用字不当,陈垣也在眉批中指出,如“非本题重要材料,则人名不必列举”“共见之文,不必多引”有的学生毛笔字不够工整,陈垣提醒其注意书法;有的同学用了一个自造的“简字”,陈垣直言不讳地写了“此字予不识”。陈垣给学生批改作业,不但认真细致,而且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,就像在课堂上写板书,“永远那么匀称,绝不潦草”。

人们谈到书法时,喜欢用一个词“手把手”。确实,“手把手”的方式可以传递用笔的直观感受,体会分寸和火候,对于把学习者快速领进门很有好处。其实,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、表扬长处,指出缺点,也是一种“手把手”的教学方法,不但对于某篇论文、某位学生大有裨益,而且事关学术态度、方法和精神的传承,难道不值得引起重视和大力提倡吗?

归国的麋鹿:失而复得三十三年

物种笔记

崔爽

33年前的今天,1985年8月24日,来自英国乌邦岛的22只麋鹿回到北京南郊的南海子公园,回到它们被传教士发现、本土灭绝又会重新孕育壮大的这块湿地,继续麋鹿的中国故事。

麋鹿俗称“四不像”,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,珍稀程度媲美大熊猫,距今已有二三百万年的生命历史,大约与人类同步。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,麋鹿曾广泛生活在东部广阔的江河湖泊等湿地环境,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,湿地被严重破坏,加之过度猎杀,明代以后,麋鹿在野外逐渐消失,仅剩在皇家猎苑中幸存的少数。最终,由于八国联军入侵,麋鹿在1900年消失在永定河畔。

到了这里,麋鹿本来和工业时代以来加速灭绝的上千种动物一样,将成为躺在南海子“世界灭绝动物墓地”的一块石碑,在化石、图片和传说中永远沉默。这种故事,人类早习惯了。

但一个英国家族改写了故事的结尾——19世纪末,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重金收集世上仅存的18头麋鹿,收养于伦敦附近的乌邦岛。

除了英国人,麋鹿的命运还与一位法国人密不可分。1865年秋,即清同治四年,法国神甫阿芒·戴维在京南皇家猎苑外隔墙一瞥,发现了这种前所未见的动物。他用20两纹银买通侍卫,趁月黑风高时运出两副完整的麋鹿骨架,并一路运至法国。鉴定结果震惊世人,这竟是一种全新物种,得英文名“戴维鹿”。

1866年,麋鹿经巴黎自然博物馆爱德华鉴定后蜚声西方科学界,它比大熊猫闻名于世至少早了半个世纪。此后十年,欧洲许多国家都从中国南海子弄到了麋鹿,流落他乡的麋鹿,分别被饲养于德、法、荷、比等国动物园中,但越养越少,处境堪忧。此后,才有了后来贝福特公爵收养麋鹿、使其绝处逢生的展开。

年到1875年,戴维在中国度过了13载悠悠岁月。13年间,他不仅向世界公布了所见之麋鹿、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珙桐(珙桐的拉丁名即以戴维的姓氏来命名)等,还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本鸟类学专著《中国之鸟类》(1877年出版)的作者,述及772种鸟,包括他见到或采集到的470种,其中58种为新种。他的著作还有《蒙古旅行记》(《华北自然产物和气候及地质情况观察》(中国鸟类生境笔记)等,可谓著述勤勉。

石像背后是戴维留下的一段话:“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宇宙的奇妙,却因以自我为中心的物欲,变得视而不见,单调无聊。上苍造就了成千上万万的与我们共生的动植物,它们也有生存权利,我们却在残酷地剥夺着它们。难道造物主造就了这么千姿百态的生命体,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杰作之一:人类,将其永远地毁掉吗?”

1985年,在动物学家的呼吁下,第十四世贝福特公爵送麋鹿回归中国。同年,我国成立了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,麋鹿种群在南海子繁育壮大,并去往全国38个野外放归地开枝散叶。从1900年本土灭

绝到1985年回归,再到如今国内种群数量突破7000只,麋鹿的发现、灭绝和复育成功是一次中外合作的动人接力。作为生态复兴的“旗舰物种”,麋鹿是活着的警示:人类啊,不要再迷路,这个“失而复得”的故事充满偶然,多少已经消失的物种并没有这种运气。



“土”味情话,其实有点“甜”

说文解字

崔蒙

说起“情话”,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“执子之手、与子偕老”的诗意表述,或者小说、影视剧作品中的深情告白。但时下,一种“土味情话”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流行起来,成为热门的情话方式。

顾名思义,“土味情话”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洋气、接地气,不使用传统“情话”的华丽词语和长篇句子,而是用一种较为简短直白、不加修饰、甚至有些诙谐幽默的方式表达情意。

网络上流行的“土味情话”内容多样、数量众多,但如果仔细观察,不难发现其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创作模式和固定的修辞手法。首先,“土味情话”的预设语境是双人对话,大多采用提问——回答——反问或解释的三段模式。例如:“你带打火机了吗?没带。那你是用什么点燃我的心呢?”“你最近是不是胖了?没有啊。可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了。”其次,“土味情话”善于利用汉语中的同音字和一词多义现象。例如:“你不要抱怨,抱我。”

“这是手心,这是脚心,你是我的小心心。”此外,“土味情话”还使用了联想、隐喻、设问、词语拆解等多种修辞手法,又结合欲扬先抑的表达方法,营造出“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”的表述效果和轻松幽默的表述氛围。例如:“你今天真讨厌。哪里讨厌?讨人喜欢、百看不厌。”“不要让我看见你。看见一次,喜欢一次。”“我是九你是三,除了你,还是你。”当然,更多的“土味情话”没有使用单一的创作

方法,而是综合运用了上述几种方式。这样看来,“土味情话”虽然叫做“情话”,却带有强烈的游戏和娱乐特质,也许称其为一种表达情意、娱人自娱的文字游戏更为恰当。

对“土味情话”的流行,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的态度。有人津津乐道、乐此不疲;有人认为这是大众审美甚至是大众文化的倒退;也有人认为“土味情话”是雅俗共赏的表达方式,是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一次难得的结合。

要真正解读“土味情话”的流行,我们需要认识到,任何一种语言表达形式都与社会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“土味情话”流行的背后,固然有“土味文化”这一因素的推动,但也有较为复杂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。首先,每一种流行语的出现,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追求娱乐的深层心理。语言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交际,“土味情话”具有的文字游戏特质使其在完成“情感表达”这一交际功能的同时还兼具了娱乐性,具有流行的基本心理因素。其次,“土味情话”满足了互联网时代人们求“新”求“特”的心理需求。在以语言文字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互联网上,使用流行话语,可以满足网民追求语言时尚的心理,而创作“土味情话”的群体自然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。最后,“土味情话”其实也可以说是释放生活压力的一种渠道。在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,年轻人承担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,甚至恋爱也可能是压力来源之一。“土味情话”使爱情以轻松、平易近人、甚至诙谐的面貌出现,可调侃、可娱乐,说过后会心一笑,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放松。

无可否认,虽然有些“土气”、不够雅致,但情话总是动人的。



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